

■ 毛泽东研究

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一次重要尝试^{*}

——评介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

刘宪阁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目前已经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的所有传记性研究论著中,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无疑应该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本。该书为走近历史伟人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作了一次最重要、“最典型”,甚至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尝试。尽管由于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等原因,白鲁恂只是“走近”,而没有真正“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毛泽东而言,这一尝试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心理世界; 心理分析; 尝试

中图分类号: A7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7835(2004) 05- 0005- 09

在目前已经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的所有传记性研究论著中,白鲁恂(Lucian W. Pye为自己取的中文名,但更多时候,他以派伊的名字而为汉语学术界所熟知)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1],无疑应该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本。凭借其对政治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中国历史的独特感悟,白鲁恂以当时可以获得的大量资料和有关研究为基础,为走近历史伟人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作了一次最重要、“最典型”,甚至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尝试。尽管由于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等原因,白鲁恂只是“走近”,而没有真正“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但对我们全面理解毛泽东而言,这一尝试即便今天也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一 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

诚如白鲁恂所注意到的:“无论从什么标准看,毛泽东都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几个伟大的政治家之一。”^[1]也正因为此,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中国革命与政治的象征符号(symbol)的毛泽东,的确吸引了无数国外研究者,他们怀着浓烈

的兴趣,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关注和考察。其中,当然包括目前汉语学术界比较熟悉也比较盛行的“政治事件”、“思想结构”和“历史情境”等研究课题。尽管如此,仍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面向值得注意,这就是以白鲁恂为代表的,目前我们还不太熟悉也不太习惯的“心理动机”层面的分析^[2]。毫无疑问,毛泽东首先是一位生活在现代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有血有肉、生动具体的人,然后才是一位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一位圆融睿智、激情飞扬的思想家,一位影响深远、令人景仰的伟大领袖。因此,要完整理解毛泽东,我们既离不开对作为公众人物的毛泽东的认识,也得对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有所把握。而“心理分析”(尽管是一个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的词)则可能是走近毛泽东的心理世界,沟通其常人世界和政治生活的一个有益桥梁。

在通往毛泽东心理世界的学术之旅上,白鲁恂并非第一人,尽管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个。实际上,在他以前,就曾有人进行过一些初步尝试。譬如,早在战后美国最负盛名的心理学家艾

* 收稿日期:2004- 05- 22

作者简介:刘宪阁(1977-),男,辽宁省东港市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思想研究。

黎克森提出“心理的延缓偿付期”(Moratorium)^[3]这个概念。多年以前,罗伯特·佩恩就已经注意到,和许多“后来成为革命者的人们”类似,在毛泽东成长历程中,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时期^[4]。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出于新闻记者的敏锐观察,那么,靠研究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广岛悲剧而起家的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罗伯特·J·理夫顿,则以一个心理历史学家的身份作了一次出色的努力。这就是他那本比白鲁恂的著作还要早8年出版并以其独创的“革命不朽”概念为核心,考察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的名作^[5]。

甚至白鲁恂自己的学生——曾经两度担任美国分管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并受到过毛泽东亲自接见的理查德·索罗门,也先于乃师作过这种心理学方面的努力。只不过,索罗门更侧重于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传统中国)的角度来解析毛泽东^[6]。

而被白鲁恂誉为“非常有洞察力”的洛维尔·迪特摩尔,也敏锐注意到,与倾向于“强制义务性”个性的刘少奇不同,毛泽东属于那种被政治心理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维尔称为具有“戏剧表演性”个性的人^[7]。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也都或多或少地触及毛泽东的心理世界。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或者仅是偶尔涉及(洛维尔),或者偏于理论描述(理夫顿),或者侧重群体心态(理查德);而对毛泽东本人,尤其是他作为个体的情感经历、成长过程与心理特征,却缺乏充分的分析与足够的认识。

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适时出版了,并因此而在有关毛泽东的各种研究论著中独树一帜,为世人走近其心理世界,作了一次极具启发意义的理论探索。

二 一次“最典型”的尝试

1976年9月9日,带着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一代伟人毛泽东走完了他轰轰烈烈、扑朔迷离的生命历程。

几乎与此同时,欧美地区碰巧也推出了两本重要的毛泽东研究专著。在这两本书中,如果说费兹杰拉德的贡献在于他敏锐地注意到毛泽东和中国之间的那种符号联系和象征意义(the Symbol)^[8]的话,那么,白鲁恂则为我们重新塑造了毛泽东这位

伟大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the Man)。按照有的学者的看法,这甚至应该是有关毛泽东心理传记中的“最典型的尝试”^[9]。

不论作为哲学理论家、政治战略家,还是经济调控者,毛泽东无疑都是伟大的。问题是:“隐藏在所有这些伟大特性背后的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11]或者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其秘密究竟在哪里?

白鲁恂相信,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于他能够理解、唤起和引导人类情感的非凡能力,以及通过他自己的人格,去驾驭他人的情感与激情的无数种方式”^[11]。

为什么?试看现代中国的历史境遇。如果说传统中国正确行为的本质,在于完全控制甚至压抑自己的感情,那么,在现代世界中倍受挫折的中国人,则“开始对诉诸于公众热情的行为很敏感”^[11]。这一点,曾经吸引了众多想要成为英雄并在其自身生活中上演人生生活剧的人物。

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他恰好具有拉斯维尔所谓“戏剧表演性”人格^[10],能够熟练掌握、驾驭他人的感情。这种性格和能力,自然可以使之对当时中国的这种情感需求做出最佳反应,从而成为造就其政治成功的独一无二、不可比拟的优势^[11]。

既然毛泽东的伟大很清楚地在他的性格特征和情感领域,那么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心理学的问题”^[11]。

这样一来,为了考察“他的个性如何促成了他的令人瞩目的政治成功”^[11],以及他为何“能如此成功地调动中国人以及其他人的情感,我们就必须去发掘他个人的情感世界,去发现他和其他人之间的那种精神联系的心理原动力”^[11]。

三 虎气和猴气——毛泽东性格中的矛盾

在政治心理学的视角下,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平面、单一的人;相反,我们还看到他是一个具体、鲜活、灵动的人。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常人情感,且颇具人情味。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极富魅力的伟大领袖为什么会如此棱角鲜明、充满矛盾,却又和谐一体?

或者说,毛泽东身上为什么会体现出他自己所声称的“虎气”和“猴气”两种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如何化解二者之间持续性的内在紧张(tension)?

在白鲁恂看来,无论是当时在许多公开文稿中表现出来的极度豪放的“虎气”,还是通过各种回忆录和报道中透露出来的敏感谨慎的“猴气”,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心理趋向和性格特征的真实流露。而毛泽东心理世界的这种隐蔽影像和焦虑核心,如果借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我们大约可以说是一个被充分放大的“自我”。

但是,白鲁恂深知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的困难与挑战。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乃至现在)的认识氛围,尤其是人们对心理分析的固有疑虑和反感,那么,这一尝试和探索的理论难度可想而知,而其所需要的勇气就更可钦可佩了。

尽管如此,在2003年8月给笔者的信中,白鲁恂坦陈:“在尝试对近乎神圣化的毛泽东进行一些心理学的分析与解释时,自己一直是在冒险,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相信:“如果在自己的分析中贸然运用任何来自于精神病学的技术术语,那都将是一种不谨慎的行为;确实,这样做,还可能会适得其反,引起不当效果”,甚至误解。

毫不奇怪,在全书中,以及其他任何场合,白鲁恂从未公开宣称:“毛泽东可能是一位带有某种边际性人格特征的自恋主义者”(a narcissist with a borderline personality)——尽管我们确实可以从毛泽东身上发现某些与心理学所谓的“边际性症候的自恋主义”(the narcissism with the borderline syndrome)相类似的现象。譬如,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怒,情感上的极度敏感、谨慎小心,以及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不得志时可以表现出“卧薪尝胆”的超常毅力,成功以后又会傲视群雄,拒绝不同见解,甚至一意孤行。“向权威挑战成为其赖以存在的生活乐趣与精神支柱”。同时,“由于这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格,所以孤独总会伴随而行,而潜意识中抑制不住的自我张显,其实是弥合其强烈疏离感的必要补充”^[9]。

四 母亲与毛泽东的情感历程

白鲁恂并未仅仅停留在这种表面的矛盾与不一致上。他更关心的是,毛泽东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与性格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和其他一些心理学者一样,白鲁恂相信,可以从毛泽东早年的情感历程中找到解答。但在进一步的考察过程中,他却发现了问题。

就形成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尤其是他对权威和反抗的态度问题而言,影响最大的似乎并非那个按照传统心理学的理论预期本来应该担负起这种作用的父亲,尽管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中接受斯诺访谈时的叙述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相反,在毛泽东的性格历程中,关键性的发展应该是他与母亲的关系,尤其是某种“前俄底普斯情结或前恋母情结”(Pre-oedipal Experience)^[1]。白鲁恂甚至将其追溯到毛泽东的婴幼儿时期。

在白氏看来,就像其他婴幼儿一样,作为长子的毛泽东曾经拥有过某种既是无能为力、同时却又无所不能的幸福状态。但随着新的兄弟姐妹的出生,他再也不能继续垄断母亲的关爱,而必须和其他兄弟共同去分享。白鲁恂相信,与母亲关系的这种变化(有点像被冷落,甚至被抛弃),自然会给毛泽东带来某种遭到不公平对待的感觉,而由此引发的情感伤害,特别是对其后来的性格塑造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母亲曾经给予毛泽东一定的安全感,但母亲也让他认识到,不应该指望人们的感情会持久。因而,为避免将来可能会出现各种抛弃、失望与伤害,就有必要保持警惕,保护自己的感情,不再使自己陷于任何情感义务的依赖与重负,并先于他人而坚决、果断地切断这种情感纽带^[1]。

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白鲁恂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作为公众人物的毛泽东为什么会那么成功的部分解释,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对忠诚、革命义务与背叛等问题,毛泽东会表现出那种非同寻常的敏感^[1]。

另一方面,最初曾经得到过温暖的哺育之爱,后来却体验了痛苦的被抛弃之感。这种反差如此之大的感情经历的奇异结合,似乎也有助于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会将对革命动员过程中情绪与感情的重要性那么欣赏、那么迷恋^[1]。

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感觉到通过感情进行革命动员的可能性,还认识到热情可能会消失的危险性。他相信大多数人们心中的愿望具有巨大的潜能,并把人们对愿望的需求转化成了对意志力的崇拜。因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意即:只要

五 从私人角色到公众人物——作为领袖的毛泽东

在明确了早年经历尤其是婴幼儿时期与母亲的关系对毛泽东个性成长历程的影响的理论假设后,余下的任务就很容易了:只需拿证据来。因此,该书的结构也很简单:三大部分十一章中,除了旨在提出假设、阐明思路的导论部分,其余两大部分不过是分别对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和作为公众人物的毛泽东的有关资料的反复考察过程。

在导论第一章中,白鲁恂特别注意毛泽东的自述:“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而有关他的各种印象——不论是作为私人角色(第二章),还是作为公众人物(第三章)——也确实表明,这是毛泽东矛盾性格的一幅绝妙自画像。白鲁恂相信,这种性格的养成乃是基于毛泽东特殊的成长经历,且一经养成,就会对他的公共性政治活动产生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白氏随后将当时所有可以获得的、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与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呈现出重要的、甚至非常关键的关系的各种信息并列起来。

第二部分侧重考察了作为私人角色的毛泽东。首先,第四章分析了毛泽东与他的家庭,尤其是与被认为对其影响巨大的母亲的亲密关系;随后的第五至八章,则分别检验了毛泽东与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父亲、他的老师、同学以及他的妻子、子女之间的关系及其性质。

白鲁恂认为,这些关系是任何人成长过程中都无法回避的,它们提供了塑造个人风格和心理品质的情感剧场,只是各人的感受可能有所不同^[1]。他相信,对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的具体理解,都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其他关系的理解,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形成对毛泽东个性特征的解释;而就上述那些关键的关系而言,这个解释应该与他们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白鲁恂的考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毛泽东的儿童时期,而是包括了毛泽东作为人“子”,怎样对待他的父亲;以及作为人“父”(成年),怎样对待他的儿子和女儿的整个人生旅程。两相参照比较,确实可以揭示出许多以往容易为人忽略的方面。

白鲁恂认为,毛泽东总是思考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并最终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其他人彼此之间的行为关系”。但不管怎样,在毛泽东的人际

有足够强的意志力,任何目标都可以实现。尽管如此,毛泽东也体验到某种疑虑。确实,那是一种深深的恐惧。他认识到,由于情感的非持久性、甚至欺骗性,一个人可能会上当受骗,失去对自我的把握。这样看来,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可能为他后来的公共生活准备了某些条件,譬如对安全感的渴望,对人民群众的迷恋,对乌托邦理想的冲动,以及对情绪性表达的热爱等^[1]。

一方面,这个天才的政治领导人,善于把握和调动迷惘中的中国大众的情绪,并向他们灌输意志力的有效性,从而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提供希望;另一方面,他总是怀疑,情绪并不持久,失望是可能的。因而,他从来不能允许自己的欲望主导自己的行动。简言之,毛泽东既对情感潜能抱有某种信任性理解,但是又怀疑情感的持久性。白鲁恂认为,在毛泽东政治风格的各种特征中,这应该“是一个中心主题”^[1]。

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能够深入中国人民内心情感的深处,并激发、调动起他们这种波涛汹涌的情感;一次又一次,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维系他们热情的能力表示出怀疑;一次又一次,毛泽东能够从狂热的情绪性政策,转向冷酷的现实工程规划,却又没有丝毫个人因素卷入的最轻微迹象。

为什么会这样?在白鲁恂看来,不论是前述那种关于抛弃和被抛弃,或者冷落、被冷落的感觉,还是后面这种对情感的信任性把握与怀疑性态度,“都是毛泽东从他母亲那儿所获取的遗产的一部分”^[1]。换言之,一切无不肇源于毛泽东婴幼儿时期母子关系的特殊经历,以及对某种理想化了的母子关系观念本身的渴望。

正因为如此,白鲁恂相信:“在形成他的基本性格方面,毛泽东与他的母亲的关系是非常关键的。”^[1]他还进一步假设“毛泽东的这些初期经历最佳地解释了他作为一个造反者,以及作为一个克理斯玛型领袖的角色”。他认为,这甚至也说明了毛泽东为什么会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的激进青年们具有那么非同寻常的吸引力:“同样的,这些人也因为类似的挫折感和愤怒而需要反抗。而之所以会有这种挫败感和愤怒感,是由于这个世界并没有满足他们在婴幼儿时期最初所瞥见的对未来生活的种种美好预期。”^[1]

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与他母亲的关系”^[1]。虽然毛泽东与其母亲的关系“必定很复杂”，甚至充满了矛盾，但由于一种被母亲抛弃了的感觉，就使他形成了某种奇特而矛盾的性格特征。作者感到幸运的是，在考察毛泽东在其他情境中对亲密关系的态度时，特别是在考察他对待自己妻子与孩子的方式，以及他与同学、同事们之间友谊关系的类型时，白鲁恂认为自己提出的那个有关母亲与毛泽东性格特征关系的假设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在此基础上，该书转向第三部分，即对毛泽东公共角色的探讨。第九章考察了他的政治创造性或者说政治技巧。为什么毛泽东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白鲁恂认为，个中秘密在于他具有某种令人叹为观止的能力，即“运用言辞的表达能力”和“运筹权力的实践能力”的奇妙结合。毕竟，在大多数文化中，既能说会道又善于做事的人都是非常少见的；而在现代中国，尤其如此^[1]。

而这，又不过是由于毛泽东能够把主导他私人生活的那种矛盾心理拓展到公共生活中。他身上的那种“猴气”，使他可能希望运用言辞所提供的稳定魔力来刺激人们，乃至惊世骇俗。他还希图借助于言辞来鼓动、甚至戏弄人们的情感。而“虎气”，则他对有关权力运作的现实情形，和人们敬畏权威的情感来源表现得非常敏感。

毫不奇怪，作为公众人物的毛泽东不断在以下二者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一个讲求言辞的人，一会儿又是一个注重行动的人。有时候，当作为政治战略家的角色遇到麻烦时，他就会突然变成一个语言大师，藉此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大跃进”运动失败后，他暂时退居二线，并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那样。而在其他一些时候，当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角色明显失去号召力时，他就会突然再度成为一个战略家，从而摆脱了所有那些有关其思想的神奇魔力的虚幻假象——譬如，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混乱情形，他采取了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动，从而为中国政治和世界秩序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但政治所涉及的，毕竟不仅仅是一般的观念与权力、计划、行动问题。真实的政治还依赖于人们的相互协调，一致工作。同样，尽管决策可能是一门独自一人就可以完成的艺术，但领导权通常是以合作式的同志关系为开始的（comradeship）。换言

之，伟大的组织者需要他的支持者们的信任。在白鲁恂看来，不幸的是，毛泽东在言辞和权力方面引人注目的成功，却是以削弱、乃至损害他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的人际关系纽带为代价。这正是第十章处理的主题，亦即白鲁恂所谓政治冷落感或者说恐惧问题。

最后一章（第十一章）中，通过把两个毛泽东（私人角色与公众人物）并列在一起，白鲁恂试图为我们勾勒出毛泽东情感之流中的某些共同模式，并确定究竟是哪些可能的性格特征与心理因素促成了这位历史伟人的政治成功。在此过程中，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各种行为模式，不但解释了他的成功与优势，也说明了他的某些困难与挑战。

六 新瓶与旧酒——本书的方法特色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的所有参考书目都稀松平常，只不过是一些常识性的史料，几乎没有什么新奇独特之处。但是，全书内容却十分精彩，睿见迭出，时有新意，引人入胜。

这是为什么？其实，不过是因为白鲁恂采用了一套汉语学术界不太熟悉、甚至也不太欣赏的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方法，套用一句俗语，就是“新瓶装旧酒”。具体来说，实际上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这只“新瓶”，把一些本来看似零散、毫不相关的史料，譬如毛泽东的肤色相貌、举止习惯、语言特征等各种“陈年旧酒”，统一装到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和心理趋向这一标签之下。

借助于这种心理分析，毛泽东的心地就再也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抽象符号，而是回到了触手可及、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沟通的常人世界。这正是该书的最大特色。也正因此，《作为领袖的毛泽东》能够在众多关于毛泽东的传记性研究中，脱颖而出，不落俗套，并最终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白鲁恂1921年出生于中国山西的一个传教士家庭，到美国后又在耶鲁大学等著名学府接受过良好的现代社会科学教育与训练，并最终成为一个从事比较政治学、尤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专家。与和他齐名、注重群体心理和一般理论研究且更为汉语学术界所熟悉的阿尔蒙德相比，白鲁恂的特色是精于东南亚区域研究，对他童年曾经生活过的中国更

是情有独钟,写有多部(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论著论文。同时,他也非常注意社会政治生活中个人因素或者说个体主动性的作用。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奇怪:为什么白鲁恂会倾向于对毛泽东这个伟大的政治家,进行个体视角下的心理分析了。也正因为受过良好的社会科学训练,并有着扎实的理论根基,加之熟稔中西历史和政治文化的不同特点,白鲁恂的《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就显得举重若轻、挥洒自如,既不乏历史的厚重感,又透露出相当的理论深度,更不必说那种世界性的比较视野了。

值得注意的是,白鲁恂亲近、接触政治心理学,并以此方法探讨中国政治现象是比较早的,他于1968年初版、1992年修订再版的名作《中国政治精神》的副题即为:“政治发展中的权威危机之心理—文化研究”^[11]。实际上,只要想象一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的知识氛围,心理学对政治学者白鲁恂的这种影响毫不为奇。但他还是强调指出,在其智识发展过程中,战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被誉为“身份的建筑师”(Identity's Architect)的艾黎克森曾经对他具有重要影响^[1]。确实,在书中我们处处可以发现艾氏心理成长理论的痕迹。譬如,白鲁恂直接挪用了艾氏“心理延缓偿付期”(Moratorium)的概念;甚至他所探讨的毛泽东性格特征中的信任与怀疑、身份认同与角色混淆、亲密关系与疏离感、孤独感等问题,也无不脱胎于艾氏的成长八阶段论^[12]。

白鲁恂毕竟不是一个开创性心理历史学家,也不是职业心理学家,而是一个关注中国和东南亚等区域研究的政治学家。因而,尽管是以一个受过训练的心理学者来收集和看待有关毛泽东的各种资料,但他仍然明确“认同自己的政治学者身份”^[11]。他力图“集中考察的,是毛泽东的个性如何促成了他令人瞩目的政治成功”^[11],或者说他的情感发展历程、心理性格特征与公共性政治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心理面向。于是,毛泽东就不再仅仅生活在理夫顿所关注的那种生存、死亡与革命不朽的狭隘焦虑中,也不是索罗门意义上的群体心态的一个被动适应者。相反,毛泽东是一个从小到大、不断成长的人,一个立体的、丰满的、鲜活的人,更是一个有血有肉、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人。

考虑到人们对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历史人物

尤其是伟大领袖的反感、疑虑乃至震怒,该书前言以“警告”一词开始(At the outset a word of warning),并劝诫那些对心理分析不以为然的读者应该就此打住。当然,那些真正对毛泽东感到好奇的人,不在此列。

白鲁恂强调:“在本书开始时,必须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分析的尝试性质”^[11]。尽管如此,他始终相信,心理分析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尤其是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们认识态度与接受能力的变化,“如果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那么,修改或者进一步证实我们对毛泽东的有关心理解释是可能的”^[11]。

近年来各方面的发展趋势,也或多或少支持了白鲁恂对毛泽东进行心理分析的这种乐观展望。当然,在此过程中,他对毛泽东的某些心理学解释也经常为人所诟病,有的甚至还受到严峻挑战。尽管如此,他仍然一直固执地坚持、坚信、坚守自己的观点,拒绝对之进行任何修正,更不用说放弃。

不管怎样,这种以心理分析为工具的独特研究方法,与考察进路,在当时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传记性研究中,非常少有,即便目前也不多见(菲利普·肖特在最近的著作中,也曾对此进行过尝试)。不管怎样,正是在白鲁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的政治心理学视野下,毛泽东又返回到了有血有肉、可能沟通的常人世界。

七 观点与史料——本书的其他特色

作为比较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家,白鲁恂对毛泽东的考察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将毛泽东置于宽泛的跨时空的比较视野下,自然是其中一个方面,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他的性格特征,以及毛泽东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与政治中的地位 and 角色。因此,这种比较,就不仅包括与传统中国政治的历史性比较,也涉及到中外之间的世界性参照。

白鲁恂注意到,毛泽东的文书风格及其批阅方式,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存在着某种有趣的相似关系。他还发现,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激进一代相比,毛泽东的反抗性格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甚至中国的主席领导制度与现代西方的经理人、董事会式经营管理机制的异同,也成为他感兴趣的比较对象。白鲁恂还注意到,在毛泽东和斯

大林两个政治领导人之间关系的风格中,透露出毛泽东和他父亲、以及毛泽东和杨昌济关系中的那种怨恨、崇敬情结的复杂纠葛。

白鲁恂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政治哲学命题,譬如,“怜悯”与“正义”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公平”的认识和评价。当然,他更关注从政治发展或者政治现代化的角度,来考察现代中国的各种现象。譬如,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与过渡过程中,情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类似地,还有传统的“朋友”观念如何向颇具现代意味的“同学”观念转变,等。白鲁恂尤其注意到,现代系统化建制教育的宿舍生活对培育和强化中国人的民族观念的影响。在他看来,“宿舍生活这种全新的文化使抽象的民族理念的合法化变得更加容易。民族理想的合法化,很容易就被表达为对权力、进步,以及反对外来干预的追求”^[1]。这一见解发前人之所未发,值得注意。

毫无疑问,任何新奇的观点都必须有充实的史料支撑,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倍受争议的心理分析更应如此。确实,我们发现,为了证明他的观点,白鲁恂曾经引证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甚至还不乏某些第一手的史料。譬如,萧瑜、周世钊、张国焘、龚楚等同学、同事的回忆,翟作军、陈昌奉等警卫员的见证,陈学昭、赵超构、埃德加·斯诺、罗伯特·佩恩等中外记者的采访,以及赫鲁晓夫、基辛格、田中角荣等政治家的印象。当然,白鲁恂也未忘记注意吸收和借鉴李锐、史华慈、施拉姆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白鲁恂还试图通过对典型文本个案的心理学解读来透视和解析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相信,毛泽东是一个总能精确传达自己情感意愿的人。考虑到这一点,《祭母文》中的某些意思含混的诗句必定给我们的理解带来一定的麻烦,因为其中所表达的情绪似乎都被系统地颠倒、翻转过来。白鲁恂推测,或许毛泽东正是通过某些精心选择的反义词来展现其真正想表达的情感。这样一来,《祭母文》就为我们理解毛泽东情感世界中的抛弃与被抛弃问题,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线索。类似地,毛泽东描写战斗情形以及怀念杨开慧的《蝶恋花》等诗词也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心理意义。而晚年毛泽东所写的《诉衷情》,可能更为贯穿全书的心理学解释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八 只见心理不见历史的心理历史分析——本书的主要问题

曾经有论者这样认为:白鲁恂的许多论著有时表现出令人难以容忍的权威脾气,特别是因为过于重视完全出自个人主观意愿的逻辑推演,他经常不太注意细致的历史事实。无疑,《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一书,也暴露出他重理论、轻史实的倾向,从而使其对毛泽东的心理-历史分析,只见“心理”,而不见“历史”。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白鲁恂过于强调婴幼儿时期以及子女出生顺序对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影响。虽然他置疑了传统心理学理论中的父亲角色,并发现了母亲的重要性(这一点值得赞扬),但他马上陷入了另一个理论陷阱。实际上,传统中国(包括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历史事实是:每个子女无没有一个婴幼儿时期,且几乎无不成长于女性或者母亲之手。换言之,婴幼儿时期的幸福感(特别是与女性、母亲的亲密关系)是每个孩童都可能拥有的——至多我们只能说,这种幸福感可能更多地为男孩而非女孩所有。无视中国具体情境中这样的普遍史实,而按照西方经验推论婴幼儿时期对毛泽东性格特征的特殊影响,实在有些过于武断。尤其是所谓的子女出生顺序,更完全是心理学按照西方经验得出的理论假设——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重男轻女。何况,即便与毛泽东同样作为长子出生的男孩,也还有许多人(包括一些名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形成毛泽东那种性格特征呢?可见,中国具体情境中的这样一些历史事实,无疑使白鲁恂有关推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与此类似的还有一个问题。白鲁恂强调了毛泽东个人的成长经历对其性格特征的重要影响,这无疑是对的,也是其成功之处。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学理论假设,如果过于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就可能走向极端,从而忽视周围的环境,特别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群体氛围对个体的影响。白鲁恂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在他看来,这种影响只是在考虑到毛泽东特殊的心理性格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譬如,他对情感,特别是毛泽东的情感经历,在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中的作用,即持这种看法。但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毛泽东对情感在公共政治中作用的认识,究竟是源自于他对婴幼儿时期情感经历(从最初的幸福感到后来的被冷落感)的记忆和反

感,还是来自于他对当时周遭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和群体氛围的体认与共鸣。而较为客观的看法,无疑应该是二者之间某种有效的互动关系。但在白鲁恂宏大的理论视野中,特别是心理分析的观察下,历史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就被简化,甚至不可避免地被“单向度”化了。于是,对毛泽东的心理-历史分析就变成了单纯的心理分析,而不见具体的历史踪影了。

诚如迪特摩尔所注意到的,虽然白氏坦陈其研究的尝试性质,并力图避免心理分析的“化约论”(Reduction)倾向,但在具体分析中,仍然透露出浓厚的“反向推论”、“后设叙事”的“还原论”色彩——该书的分析始于对毛泽东性格的描述,并以此类性格的逻辑期待为基础,重建毛泽东的个人成长经历(尤其童年经历);然后,再从这种经过重建的经历中推断(实际上是再度确认)特定的性格行为模式。同时,和同时期的许多著作一样,该书的研究目的部分也是为了解释毛泽东与当时的中国政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个世纪伟人。他的性格特征、心理趋向与政治活动是外部情势与个人经历等各种因素交错互动、彼此影响的漫长历史进程的结果。所以,造就他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样,他的功绩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他的意义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视角下才能够得到恰当的考察、解释和评估。就此而言,白鲁恂并未给我们勾勒一幅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毛泽东画像——充其量,他只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定视角下的毛泽东,尽管这一视角可能非常重要。

即便抛开这些因心理学理论层面上的固有问题而出现的淡化、忽略乃至无视历史的现象不谈,在一些具体历史事实上,白鲁恂有时也不免有所误解乃至误用。无疑,西方学者在现代学术训练以及资料收集工作等方面堪称典范,但是,由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知识背景等种种原因,他们在研究中仍然难免某些技术性的失误,乃至根本误读中国历史。所以,哪怕是精通中文的白鲁恂,也难以摆脱这种困境与尴尬。

白鲁恂认为,由于童年时代缺少“赶场”经历所带来的那种愉悦感,毛泽东对经济问题没有兴趣。但如果仔细翻阅已公开发表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文献,我们就

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泽东都非常重视财政经济。

在论及有关毛泽东的私人印象时,白鲁恂甚至还引用了《红色舞台》(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版)一书。但实际上,这本书不过是一种传奇性的演义罢了,作者“李昂”也只是一个化名,因而无法作为信史,以供学术引证。这样一来,就像当年的史华慈等人一样,白鲁恂也难免迷失“在史料的丛林中”^[13]。类似地,该书还有其他一些常识性史料错误,如称李锐为毛泽东的同学,毛远新为毛泽覃的儿子,如此等等。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整体来看,仍然不过是白璧微瑕,并不影响全书的论证效果、学术价值和精彩魅力。相信读者在品味原书时,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

九 走“近”与走“进”——未完成的任务

不论从历史无法完全还原的严谨意义上讲,还是从政治心理学研究本身的特点(即不是从中国历史事实,而是从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假设出发)来看,抑或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同情式理解而言,白鲁恂其实只是“走近”了、而没有真正“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

尽管如此,这可能仍然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甚至汉语学术界)对毛泽东心理分析的一次最重要、甚至最为成功的一次尝试。他所提出的有关毛泽东性格特征的一些命题,尽管在论证逻辑、事实证明等方面可能不太严谨,但仍然非常有启发性,不容忽视。

对深化认识、全面理解毛泽东这位历史伟人而言,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来加以考察,并试图努力走近,乃至最终走进毛泽东的心理世界,这当然是不无裨益的。就此而言,白鲁恂的奠基与开创之功,实不可没。

在通往认识毛泽东、走近其心理世界的漫漫征程上,我们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包括白鲁恂等国外研究者已经先我们迈出了第一步。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更是一项有益的探索。对不太重视甚至相当缺乏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及其规范的传统与训练的汉语学术界而言,这种尝试和探索具有不可或缺或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我

们就可能比国外研究者更容易走近毛泽东,理解毛泽东。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汉语学术界走进毛泽东心理世界的作品早日出现——哪怕仅仅是一次粗浅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Lucian W. Pye,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 [2] 萧延中. 如何解读毛泽东——试论晚年毛泽东研究的四个层面[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3, (6): 118-125.
- [3] Lucian W. Pye, *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Bruce Mazlish, ed.,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3, p165-166.
- [4] Robert Payne, *Mao Tse-tung: Ruler of Red China*,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 [5] 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ality: Mao Tse-tung and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6]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7] Lowell Dittmer, *Mao Tse-tung: the Man and the Symbol*, *China Quarters*, Vol. 4, 1976, p822-828.
- [8] Charles P. Fitzgerald, *Mao Tse-tung and China*,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76.
- [9] 萧延中.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7.
- [10] Harold Lasswell,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8.
- [11]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8.
- [12] Lawrence Jacob Friedman, *Identity's Architect: A Biography of Erik H. Erikson*, Cambridge: (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3] 高华. 在史料的丛林中——读陈永发新著《中国共产党革命七十年》[J]. (香港)二十一世纪, 1999, (6): 115-121.

One Important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Inner World of Mao Tse-tung: Some Notes about Lucian W. Pye's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LIU Xian-g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mong all the published biographical works about Mao Tse-tung, Lucian W. Pye's *Mao Tse-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ypical, and even the most successful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inner world of Mao Tse-tung, is undoubtedly worthy of being noticed. Although the book just roughly approached, but didn't really go into the inner world of Mao Tse-tung, due to its questionabl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s and political positions, it is still instructive for us to wholly and completely understand Mao Tse-tung.

Key words: Mao Tse-tung; inner world; psychotic analytics; important attempt

(责任编辑 龙四清)